

十月革命与李大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

吴汉全, 魏文芳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1121)

摘要: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是为中国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时, 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人民革命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等联系起来, 揭示了十月革命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十月革命的宣传, 李大钊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念, 并以实际行动来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由此, 李大钊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关键词:李大钊; 十月革命; 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1-0001-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1.001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Li Dazhao's Quest for Scientific Socialism

WU Han-quan, WEI Wen-fang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n Chinese society was enormous,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was that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began to develop in China. Li Dazhao publicize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inked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guidance,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people's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development path, and revealed the positi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ocialism. Through the publicity, Li Dazhao established the socialist belief and started to pursue the bright future of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practical actions. Thereafter Li Dazhao opened the hist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spread in China.

Key Words: Li Dazhao; the October Revolution; scientific Socialism;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ocialism

学术界对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历史贡献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肯定了李大钊是宣传十月革命的先驱。但既有研究, 对于李大钊宣传

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 鲜有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作出科学定位的^①。在笔者看来,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

基金项目:202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YJA710042)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 男, 江苏大丰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社会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传入中国, 梁启超、朱执信等人就曾对其进行过探讨, 这可称之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李大钊 1919 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的。而本文认为, 在李大钊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时, 已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故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 可以说开启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以后的事,但 1918 年李大钊对十月革命进行研究和宣传时,触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故而此时标志着他对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开始,从而也就拉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这同时也奠定了李大钊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地位。

—

1917 年 11 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壮举,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新时代,有力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各国的传播与实践。1918 年,李大钊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早期介绍阶段转入传播阶段。这是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大贡献。

考察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思想意蕴,一定要注意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基础。十月革命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的道路。当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均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即中国国情在很大程度上“皆与俄国相近”,所以认为中国“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①。李大钊在阐述自己对俄罗斯文明的认识时,认为“俄罗斯文明”实具有调和中西文明之资格,故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1]219}。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爆发后在中国不遗余力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确认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对李大钊思想的转变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使李大钊在中国开启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同时此宣传适应了新文化运动由早期的“个性解放”向五四运动后的“社会改造”转变的需要。从李大钊自身的思想历程来看,十月革命对李大钊思想的转变产生了

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

一是十月革命的群众运动促成李大钊思想由民彝史观向群众史观转变。从社会历史观来说,李大钊的早期思想贯穿着其特有的民彝史观,这使他高度注重群众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和力量,但这种注重是抽象的,他理解的重点并非是群众的社会实践,而是群众的心理、意志、精神等方面,并没有意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的决定作用;正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钊受到俄国革命中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感染,他才认识到群众在变革社会的政治斗争中所显示的巨大物质力量。由此,李大钊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群众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成为其认定群众创造历史的主要依据。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为实现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人民群众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得到集中体现。李大钊认为“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并且预言 20 世纪的世界将“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1]244}。他十分重视俄国群众运动,认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1]239},而且十月革命因为有“群众运动”这样具体的形式才“唤起世界的群众运动”,因而也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来摧毁一切反动势力,包括历史上任何一切“残余的东西”^{[1]246}。此时,李大钊所理解的群众不再是过去所说的那种单纯的精神、意志的力量,而是在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力量,群众才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动力。这说明,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李大钊开始脱离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靠近。

二是十月革命的社会革命方式推动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革命论者转变。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的特点是只承认渐变而否认突变(革命)。早期李大钊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承认“革命”的意义(如对辛亥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但总

^① 出自 1921 年 1 月初彭璜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 30 卷《人物志(下)》,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3 页。

体上说,他是一位非暴力革命论者;而十月革命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完成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不仅创建了劳农专政的政府,而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对李大钊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李大钊通过对托洛茨基的《Bolsheviki 与世界和平》一书进行评说,认识到在十月革命中暴力斗争的突出作用,指出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线,认为“俄罗斯式的革命”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意义和价值,代表着“二十世纪式的革命”^{[1]246}。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认识到,十月革命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宗主”的,其目的就是打破“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1]243}。可见,李大钊通过对十月革命的理解,为他接受唯物史观、理解社会革命的意义创造了条件。

三是十月革命使李大钊的认识视野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研究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思想意蕴,不能不注意分析李大钊思想方式所出现的重大变化,因为没有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化他就不可能解读出十月革命的新内涵。就认识视野而言,李大钊在接受十月革命影响以前,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上,总是把目光集中在英、法、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传统的“西方”,并努力从那里汲取思想的智慧。而李大钊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后就不同了,他突出地关注俄国革命,研究俄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及群众性的社会实践,这是以苏俄为代表的新式的“西方”(“五四”话语中亦称为“新俄”),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就思维方式而言,李大钊在受到十月革命影响以前,总是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的变迁,很少从经济的角度来揭示历史变化的动因。而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进而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纳入思想认识的视域之中,试图从经济方面来探寻一战的起因,并集中地研究和阐发世界历史变动的趋势。他在宣传十月革命时指出,一战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希望“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进而

“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239}。李大钊此时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一战的原因,相比他一年前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中将一战原因归于“贪与憎恨性”^{[1]25},在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同时也说明,十月革命对李大钊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简要梳理,不难看出,李大钊宣传俄国十月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变,集中地表征了他此时的群众观、革命理念及思维方式的变化。显然,这里群众观、革命理念的变化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是分不开的,而李大钊此时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概括地说,十月革命促进了李大钊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正是以十月革命的宣传为起点,李大钊开始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指明的革命道路。这为李大钊进一步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及系统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条件。

进而言之,李大钊通过在中国率先宣传十月革命这一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变,在其思想认识层面形成了一个关于十月革命的话语文本。在这个文本中集中地体现了“革命的十月革命”“庶民的十月革命”“自由的十月革命”“文化的十月革命”“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等基本观点^[2]。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的话语文本所包含的思想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众本位思想和社会革命理念为基本线索的,这是在他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建构起来的。故而,从文本中的观点来看,可以体会到这个关于十月革命的话语文本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蕴,并进而认知这个文本中所蕴含的李大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追求。

二

在十月革命之前,李大钊就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接触,但由于当时他的世界观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对社会革命手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处于比较粗

浅的层次。在《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中,李大钊认为欧洲各国社会党“凡持社会主义者莫不反对战争”^{[1]123}。李大钊在这里通过对“社会主义反对战争”的释义,说明了社会主义代表“下级劳动社会”而与资本主义处于对立的立场,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态度。其后,李大钊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中,又阐释了“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1]141}的道理,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的看法。不难看出,李大钊此时已经预见到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正如民主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亦有取代资本主义的演进趋势。上面引证的这些材料也说明,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对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总体来说此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比较粗浅的,并没有进入到理论自觉的阶段。因为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如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如何、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是什么、如何才能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等,李大钊并无明确的理论说明。在笔者看来,李大钊此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所表现出的粗浅性,大致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有所发展,但其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还没有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尤其是第二国际对殖民地附庸国采取了沙文主义的立场,这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故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播及其在社会变革运动中作用的发挥尚待时日;二是由于当时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不仅是片面的、片段的,而且也是比较零碎、不成体系的,亦即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还未进入到系统的传播阶段,这使李大钊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思想材料非常有限,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又正确的认识;三是由于李大钊个人早期的思想认识尚处在民主主义阶段,正在热烈地追求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观念,未能以主要的精力去追寻社会主义的真谛。这就是说,

李大钊的早期思想状况,与当时的社会历史阶段是紧密联系的。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开启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事变,它为李大钊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典型的范例,从而开启了李大钊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活动历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新阶段,亦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诞生于俄国革命,而与影响世界文明的法国革命有绝大的不同。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同的地位,是由各自革命的内容、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法兰西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而俄罗斯革命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并且还是具有“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所以两者“非可同日而语”^{[1]216-217}。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典范,而李大钊强调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蕴,这肯定了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社会演进的新范式,十月革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这是因为自此以后“劳动阶级”将联合起来,使现行的“生产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并结成新的具有社会合理性的“生产者的结合”,而最终完成“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任务^{[1]251-252}。第二,社会主义是以社会革命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的。李大钊基于对十月革命的研究,认为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阶级斗争手段,通过革命战争的形式反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俄国革命乃是“阶级战争”,是通过联合“世界无产庶民”进行的“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1]243}。而且,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也相继发生,并且“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它们完全就是“俄罗斯式的革命”^{[1]245-246}。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

位及社会主义革命手段的揭示,反映出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社会变革的趋势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李大钊以“新纪元”和“社会革命”等范畴来解读并评价十月革命,不仅肯定了十月革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新纪元”地位,而且也阐发了十月革命所内含的“社会革命”的根本性特质。从社会发展的前景及中国未来的变革道路来看,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突出地寄予了对社会主义光明前景的热切期待,并且这种热切期待乃是与中国自身“社会改造”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李大钊重点宣传十月革命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为中国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目标。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有绝大的不同。并且他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代表着20世纪的世界文明,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故而20世纪以后的世界新文明就源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1]216}。近代以来,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非常推崇西方文明,试图用其探寻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于是有辛亥革命模仿美国、早期新文化运动追随法兰西的探索轨迹。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则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注目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启了“以俄为师”的道路,并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对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崭新的选择。由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向,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的共同目标。第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使中国知识界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认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创造了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进而揭示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这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可能普遍地认识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时,则重点地使十月革命的意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联系。李大钊说,俄国革命所奉行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领导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主张革命的政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俄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打破“社会主义的障碍”,也就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243}。这里,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革命相联系、与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建设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相联系,从而更好地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坚持社会革命理论的前提下来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概而言之,李大钊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的开始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开始,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入传播阶段的开始。在李大钊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最能体现出他面向世界、立足中国的独特风格以及他重点地聚焦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态度,并初步地表现出他力图将外来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念^①。此时,尽管李大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所能接触到的科学社会主义资料还十分有限,但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造了舆论,从而引导人们在认识十月革命的进程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文化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可以说,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使新文

^① “结合”的理念乃是李大钊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先驱的重要特色,并且也是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关键思想。参见吴汉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化运动在广阔的视野中得到新的提升,适应了新文化运动由“个性解放”向“社会改造”转变的需要,加速了“主义”引进的历史进程,使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理想朝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并引领人们在“以俄为师”的道路上沿着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三

李大钊在宣传十月革命之后,又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将目光聚焦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目标。从近代思想发展进程及李大钊自身思想演进轨迹来看,李大钊十分坚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必胜的理想信念,义不容辞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追求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首先,李大钊坚定不移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论争中捍卫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乃是先进知识分子追寻的理想,这样的理想能否实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变为现实,问题的答案是在思想论争中不断推进的。故而,离开了对思想论争的考察,难以表征李大钊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追寻所作出的努力。事实也是,在五四时期这样特定的历史阶段,李大钊与反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三次重大的思想论争,而论争坚定了他的信念,促进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思考。一是李大钊在论争中勇敢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李大钊同胡适的论争中,胡适发表文章批评所谓“高谈社会主义”^[3]的言论,将矛头指向正在中国思想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李大钊表明自己“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态度,坚信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随后,社会主义论争在思想界兴起,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予以质疑和批评。譬如,梁启超当时就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贫穷,中国不能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劳动阶级”^[4]。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国不仅有“劳动阶级”的存在,而且中国的“劳动阶级”同“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相比更为“苦痛”,因而在全世界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风潮中,想“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5]85}。李大钊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不遗余力,为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大努力。二是李大钊善于在论争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针对人们模糊的、错误的思想认识来正确阐释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之在“五四”后获得了中国思想界话语权势的地位,但当时不少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存在着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各种新思潮也往往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进行宣传。有的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仅仅是口头宣传,而与社会实际无关。这就将社会主义局限在思想宣传层面,而与丰富且生动的社会生活实际割裂开来。李大钊认为,“主义”有理想性的一面,但也有实用性的一面,宣传“主义”并不与社会实际相背离,故而在继续宣传时应“誓向实际的方面去着”^{[6]2-3}。当时,张东荪戴着“社会主义”的假面具,想着继续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提出了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的主张,认为中国“贫穷到了极点”,只能是“增加富力”,而所谓的“增加富力的方法”,也只能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7]。张东荪的言论,在于说明资本主义有着“增加富力”的实际作用,而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中国“贫穷”的实际问题。对此,李大钊说,中国确实需要发展实业,“中国经济之厄运已至,实业确有振兴之必要”^{[5]80},但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方法,“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5]80}。李大钊还批判了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社会主义限制个人自由的错误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提倡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的自由是“合理的

个人主义”,是“秩序中的自由”^{[5]62},它限制的只是社会上极少数的“资本主义者之自由”,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多数人的自由”乃是“增加”的^{[5]4}。总之,在论争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阐释,有助于人们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三是李大钊努力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对社会主义之共性与个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主义要由理想转变为群众的社会实践,这也是社会主义能够成为现实的关键所在。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李大钊希望人们能够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研究,要重点地翻译社会主义的原著,探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5]65}。这说明,李大钊十分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要与中国实际现状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且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5]5}。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特殊的一面,而李大钊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现状结合研究的思路,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指明了方向。

其次,李大钊努力从学理的角度来阐释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论证社会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信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共识。李大钊从学理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造成必然之结果”,故而“社会主义之来临”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正如“夜之继日,地球绕日之一样确实”^{[5]15}。社会主义到底如何能够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呢?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点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

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集中的最突出的结果乃是无产阶级的出现,这便于无产阶级提升阶级觉悟及组织性,同时也便于无产阶级团结战斗。因此,“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他们集合的地点,便是资本家的大工厂,他们有了‘阶级自觉’”,这样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了能够“致其死命”的无产阶级。李大钊还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作了生动的解说,他以“鸡子打破他的卵壳”作比喻来说明这一规律的道理^{[5]183}。李大钊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论作了这样的总结:“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的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6]292}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变革社会的科学理论,而且还是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李大钊从学理的角度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再次,李大钊还用“大同”概念来阐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进行了畅想。李大钊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他在五四时期能够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宣传,离不开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的文化基础。“大同”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思想意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一个国家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对未来社会的理想设计与规划,而在近代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这突出体现了中国人理想性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在社会愿景方面的思想探索与精神追求。李大钊将其在思想由进化论转换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过程中提出的“大同团结”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所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机地统合起来,这在思想建构上是有其特别之处的:一是将“大同团结”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使传统的“大同理想”在思想意蕴上得到了新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结合的积极尝试;二是认为“大同团结”的理想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使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自由与秩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有机的统一,亦即使既有思想资源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相统一;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思想为指导,在“人民革命”的理念中科学地揭示了实现“世界大同”的具体途径^[8]。从理论上说,作为外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和成长,必须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范畴如“大同”等加以创造性的阐释,将之赋予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从而成为容纳新思想、新理念的新范畴。这大致也是近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成和发展的重要路径^①。李大钊通过对“大同”意义的解读及对达到“大同世界”路径的揭示,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人的传统理想结合起来,一方面指明了社会主义与“大同世界”内在的意义关联及它们的逻辑进路,另一方面凸显了社会主义在达到“大同世界”中的突出地位;不仅对社会主义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而且也为世界的改造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总之,李大钊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与他本人对十月革命的积极宣传以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分不开的。十月革命是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变,其对于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皆是巨大的并且也是多方面的。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地运用生产力的观点研究社会历史的变革问题,阐明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作用,从而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积极传播了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后,李大钊在取鉴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揭示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及其实现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中国走“以俄为师”的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是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而开始的,李大钊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前驱,同时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 吴汉全. 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文本解读[J]. 理论视野,2011(4):17-20.
- [3] 胡适.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M]//胡适文存:一集. 合肥:黄山书社,1996:252.
- [4] 梁启超.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M]//梁任公白话文钞. 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25:77-87.
- [5]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7] 张东荪. 张东荪谈“社会主义”[M]//高军,李慎兆,严怀德,等.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80.
- [8] 吴汉全. 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5(2):231-236.

(责任编辑:李秀荣)

^① 譬如,“实事求是”乃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毛泽东对这个范畴加以改造后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蕴,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新表达。又譬如,“规矩”本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范畴,而习近平总书记在研究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时,将这个范畴加以全面改造并赋予其新内涵,确认党章是“总规矩”、政治纪律等是“政治规矩”,从而使“规矩”这个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中的新范畴。